趣谈新春年俗

古代过年为啥要贴门神像?

每到喜气洋洋的新年,在一些人家的大门口,总能看到上面贴着一对或威武的或眉眼慈祥的“门神”,画工也许很简单,却也为春节添上一丝别样的韵味。

门神是中国民间所称的“司门守卫之神”,人们将其神像贴于门上,用以驱邪避鬼、守卫家宅平安,是中国民间深受人们欢迎的守护神。

为啥古时过年要贴门神像?

门神,是民间信奉的“司门之神”,在新春时节祭祀门神、张贴门神画的习俗由来已久。

《礼记》是一部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书籍,相传为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所作,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记载了先秦礼制。其中《祭法》中讲道:“王为群姓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大夫立三祀,适士立二祀,皆有‘门’……”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俗?有一种说法称,门神实际源于上古时期的自然崇拜。

那时,古人认为,家中的门、灶台等皆有“神灵”,由于门供日常出入,地位比较重要,所以祭祀时,它是五祀(门、户、中溜、灶、行五种主要祭祀)之首,后来演变为门神。

民俗学专家王娟解释,一般贴“门神”,要在除夕吃年夜饭之前贴。古代大门分两扇,贴门神像时刚好一左一右。

古代科学、医疗水平比较低,瘟疫疾病对人们生存威胁比较大。所以,门神成了民间颇受欢迎的守护神,大家愿意在新春佳节、除旧迎新的时候贴上门神神像,请它们守卫家宅、祛除邪祟。

除了神荼和郁垒,古代“门神”还有谁?

民间传说中,古代比较早成为门神的是神荼和郁垒二神。

《山海经》里说有一座“度朔山”,山上有一株很大的桃树。在桃树枝干延伸出去的东北处,有一座“鬼门”,把守此门的两位神将,就是神荼和郁垒。

他们的职责,便是防止害人的鬼物进入世人家中,也因此受到了人们的敬仰,把二人作为门神贴于门上驱邪挡煞。

随着时间流逝,“门神”人数开始增加。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门神”,大概是秦琼和尉迟恭。此外,还有钟馗、包公、文天祥等等,明朝的海瑞,后来也成为“门神”中的一员。

还有一类祈福门神即为福、禄、寿三星。这些门神虽出现的时间、区域不太一致,但都代表了人们祈福的愿望。

新年贴“门神”背后的美好心愿

虽然都有祈求吉祥的寓意,不过,早年间门上的“门神”并不是画,而是用桃木板雕刻成的实物。有时候是只刻上“神荼”“郁垒”二神的名字,有时候是雕刻出二人的形象。

《搜神记》里提到“今俗法,每以腊终除夕,饰桃人,垂韦索,画虎于门,左右置二灯,象虎眠,以驱不祥。”

魏晋南北朝,过新年时大门上要有门神像的习俗在民间已颇为流行。宗懔《荆楚岁时记》说:“岁旦,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

也有人说,桃符后来被借指春联。但不管怎样,桃符每年要更换一次。北宋文学家王安石在《春日》里描绘人们过新年时的景致,“总把新桃换旧符”一句,便印证了这种民间习俗。

门神画的风格却不一而足。“武门神”一般穿袍挂戴、气势威武,“祈福类”的门神要慈眉善目一些。有时候,画上还饰有爵鹿、蝠喜等喜庆图案,契合新年的祥和氛围。

其实,正如民俗学专家所言,过年贴门神画体现的是古人希望家人平安、来年吉祥如意的心愿。那也是人们对新一年美好的憧憬和再朴素不过的期待。 □尚云

饺子是谁发明的?

中国人的春节大抵都少不了一顿饺子,圆滚滚形似元宝,既好吃,又有吉祥的好寓意。

医圣张仲景正是传说中饺子的发明者。

饺子,医圣……横跨美食与医学两个领域,怎么看也不像是同一个人的成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张仲景能成为名医,倒不算偶然事件。他大约生于公元150-154年,少年便仰慕扁鹊等名医的高超医术,这大概为其学医奠定了心理基础。

他生活的时期,社会环境又是怎样呢?

时值东汉末年,兵祸连绵,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加之疫病流行,许多人因此失去生命。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张仲景的家族也未能幸免。他曾提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原本大家庭中的两百多人,在不到十年间里,竟然有三分之二的人因疫病去世,幸存者无多。目睹此景,张仲景立志学习医术,济世救人。

拜同族叔叔张伯祖为师后,为专心读书,张仲景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堵死门窗,只留一个小洞传送饭菜和水,读完了《难经》《黄帝内经》等医学著作,背熟数千条汤头歌。

明·李廉《医史·张仲景补传》记载,“(张仲景)工于治疗,尤精经方,遂大有时誉……少时与同郡何顒客游洛阳,顒深知其学,谓人曰,仲景之术精于伯祖,起病之验,虽鬼神莫能知之,真一世之神医也。”

那时的张仲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久即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

他对仕途颇为轻视,也不愿意做官。曾有这样一个故事,讲到张仲景一度担任长沙太守,但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就不再办公,而是在大堂上为人置案诊病,即“坐堂”。因此,后人尊称张仲景为张长沙,其方为长沙方。

传说中,饺子也是在他卸任长沙太守、告老还乡时发明的。

返乡路上,正是寒冬时节,北风刺骨,大雪纷飞。张仲景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衣不蔽体,饿得面黄肌瘦不说,耳朵也冻烂了,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他总琢磨着,能不能想出一个办法来帮帮那些穷苦百姓。日思夜想,张仲景研究出一个好方法:喝一碗“祛寒娇耳汤”。

他先让徒弟们在空地上搭起棚子,支起大锅,把羊肉和一些祛寒的药物放在锅里煮熟,捞出来切碎;然后用面皮包起来,做成形似耳朵的样子,就叫做“娇耳”,再下锅煮熟。

每个穷人,都能从这儿免费领到一碗汤、2个“娇耳”——也就是后来的饺子。吃完之后,人们浑身发暖,再也没那么多人冻伤耳朵了。

行医救人的同时,有感于族人和老百姓无辜染上疫病而亡,张仲景开始耗费精力,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良方,包括许多民间验方,对坐药、洗浴、舌下含药等多种治病方法都加以细致研究,期待能让人们少受疾病之苦。

“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

张仲景《伤寒卒病论集》。

经过许多年的努力,他获得了大量医学资料,结合自己在临床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最终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据考证,此时大约是公元205年左右。

只可惜,没过多久,张仲景就过世了。有史料记载,他大约卒于公元215-219年。那部奇书一度散轶,后来由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才得以传世。到了宋代,渐次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

□上官云

■往事

一份报告引发的“打虎”运动

『三反』运动

1951年底,党中央在全国发起了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的“三反”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打虎”成为这场运动的聚焦点。为什么在新中国刚成立、各项事业热火朝天推进之时,要开展“打虎”运动?

① 东北局的一份报告

1951年8月31日,东北局召开的一次党员干部大会提出,自东北转入经济建设工作为中心后,一些党员干部经不住资产阶级的诱惑,产生了严重的贪污蜕化。不仅如此,在东北一级机关中也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他们对于盗窃国家财富、侵吞公产的行为熟视无睹。大会建议在东北一级机关开展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重点揭发、打击贪污蜕化以及官僚主义现象。随后,东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运动。近三个月中,共揭发3629人有贪污行为,仅东北贸易部检举揭发的金额就高达5亿元人民币(旧币,下同)。由此,贪污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机关开支也随之大大紧缩。11月1日,东北局将开展这项运动的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并第一次将增产节约和反贪污斗争联系起来。毛泽东阅后敏锐地觉察到,政府部门各级干部贪污腐化问题不仅在东北,而且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一个相当严重和迫切的任务。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已呈现长期化的态势。为支持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国家的全年预算比1950年预算增加了60%,其中总预算的32%直接用于朝鲜战场。而未来的一年,国家计划进行多个重点项目的建设,这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新中国面临着一个非常尖锐的矛盾:支出大幅度增加,但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要解决这个矛盾,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增产节约。10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式上,毛泽东提出要开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运动。他强调,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战争,为了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必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这是中国人民当前的中心任务。随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② 毛泽东下定“打虎”决心

东北局报告上来之后,中央又陆续接到其他各地反映党员干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报告。北京市的报告反映,其机关和企业部门中发现有贪污分子600多人,贪污金额共达15亿元。西南区的报告反映,1950年上半年该区就发生贪污、渎职案件2000多件,折合人民币110余亿元,粮食200多吨。尤其是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时任书记兼专员张子善的贪污问题令人触目惊心,这两人胆大妄为,暗通曲款,动用各种粮食折款30.4亿元,同时还克扣工程款获利22亿余元,冒充修建名义骗取银行贷款40亿元私用。这些情况报到中央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深感事态的严重,更加坚定了“打虎”的决心。

1951年12月,中央出台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明确提出全体党员和干部,凡是利用职权进行贪污、浪费,都属于严重的犯罪行为。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党政军三个系统,自上而下在各级分别成立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由主要领导同志专司负责,彻底揭露打击各种贪污行为,对大贪污犯予以重点惩处,对中小贪污犯主要是教育改造。这样,新中国第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③ “打老虎”必须“穷追务获”

自1952年1月中旬后,“打虎”成为“三反”运动的高潮和焦点。当时规定,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是中小“老虎”,贪污1亿元以上的是“大老虎”。在这一阶段,毛泽东为推动全党全国全军强力“打虎”,批转了大量的报告,写了很多的指示、批语和书信。他强调:“无论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大批地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要求把注意力集中到搜寻“大老虎”上,穷追务获;对还没有做出“打虎”预算的,要抓紧预算报告中央;要总结“打虎”经验,组织专门“打虎”力量,向“大小老虎”突击,对“打虎”运动进行了强有力的指导。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有力推动下,全国的“打虎”运动走向高潮。河北省在保定召开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公判大会,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北京市召集各单位领导开会,责成上报“打虎”的具体数目,要求主要领导亲自上阵“打虎”,务期必成。随后“许多原以为没有或很少‘老虎’的,查出了许多‘老虎’”。华北军区通过组织“打虎基干队”,专案专人,包打包查,把“打虎”专业化,在5天内查出“大小老虎”288只,其中“大老虎”12只,贪污款额总计65亿元。广东则是先找“老虎窝”,然后大胆怀疑,作出假设,进行搜集材料,最后对材料分析,找出矛盾。小会挤,大会压,个人谈。每一个“老虎”都开一个“户头”,登记材料。这样,不管“老虎”如何老奸巨猾,都可以攻破。当时,在广东广为流传着一首顺口溜:“贪污分子你睁开眼,两条道路由你挑。一条活路,一条绝路;一条光明,一条黑暗。想想吧,看你走向哪一条?彻底坦白,从宽处理,拒绝坦白要严办。”

“打虎”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反对贪污腐败的初战,对党执政条件下保持自身廉洁的一次有益探索。通过“打虎”运动,惩戒和肃清了党内的一批贪污腐败分子,震慑了全体党员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自进城后日趋严重的拜金主义思想和权力寻租现象,有力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正如邓小平所说,不进行“三反”运动不行,但早进行条件不成熟,再迟一点更不行,那一时期是条件最成熟的。 □颜慧

■钩沉

■人物春秋

曹雪芹的园林基因

没吃过、没玩过、没经过、没见过、没过过富贵的日子,能写公子哥儿吗?

没沉浸在优美的园林环境中、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没对园林进行过心灵的解读,能写园林吗?

拿着大观园图纸写《红楼梦》的曹公,打小就是一位公子哥儿。他家祖孙三代中有四人做过江宁织造,从他太祖爷曹振彦算起,他可是含着金勺子出生的“富五代”。他生在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睁开眼就是绿树繁花、锦衣玉食,和姐姐妹妹藏猫猫的假山是奇、瘦、透、漏的太湖石,读的书是他祖父曹寅的十万余册善本藏书……

曹雪芹出生的江宁织造府西侧,有被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称作“西园”的园林,这是典型的江南私家园林,格局虽小却清雅幽静。园中的楝树是曹雪芹的曾祖曹玺亲手所植,为纪念父亲,曹寅又在树旁建了楝亭。曹雪芹的曾祖曹玺、祖父曹寅、父亲曹頫、叔父曹頫在这里接待京城来的要员,与江南才子诗酒茶话。这里曾经因为一次雅集而留下一幅画,这幅画又让那次雅集成为千古佳话:纳兰容若过世十年之际,曹寅与来访的庐江郡守张纯修、江宁知府施世纶在楝亭内秉烛夜话,话题是缅怀大家共同的好友纳兰容若。张纯修把这个的难忘场景即时记录下来,是为《楝亭夜话图》。

关于曹雪芹的出生地还有苏州织造署一说。有学者认为曹雪芹出生在他舅爷李煦的苏州织造署,也就是现在的苏州第十中学,这里也是典型的江南园林。李煦在这里主持苏州织造工作三十年,织造署的西花园堆山凿池,曲尽自然人文之妙。

就这样,出生在如诗似画的江南园林,从小在花园里读书、游戏,让曹雪芹对园中的建筑、匾额、山石、溪流、草木十分熟悉。曹雪芹在亭台楼阁间渐渐长大,南京的夫子庙、鬼脸城,苏州的拙政园、留园、阊门、虎丘,都留有少年雪芹的足迹。十三年的浸染,园中四时不同的景物变化,在曹雪芹心中留下抹不去的华丽底色。这些种在骨子里的园林审美,让他在描写《红楼梦》的园林时十分得心应手。

还不止如此,北京流传着一句老话:“三辈子会吃,五辈子会穿。”在曹雪芹的血液里,园林的基因由来已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经监造过“三山五园”之一的畅春园。畅春园即将建好之时,康熙帝又让李煦担任畅春园的总管。

畅春园在海淀镇的西北侧,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西门外。当年这里水草丰美、万泉涌流、杨柳茂盛,是造园的首选之地。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开始第一次南巡,就是在这一年,畅春园动工营造,历时十几年建成。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以内务府郎中的身份监造了畅春园西花园工程,直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外放苏州织造一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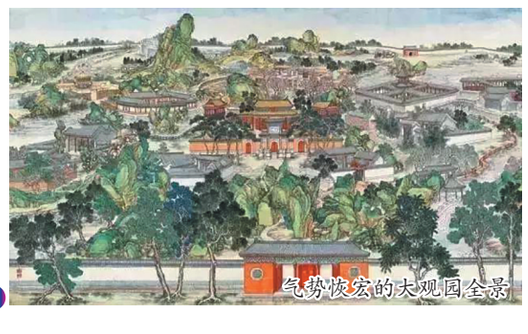
李煦也在营造畅春园的十几年中出了大力,康熙帝安排李煦做了畅春园的第一任总管。三年后,康熙帝让李煦接替曹寅做了苏州织造,而曹寅转任江宁(南京)织造。

康熙五十一年(1712)上元节,曹寅应召到畅春园赏灯、赐宴,这是举家南迁赴任二十年后,他最后一次故地重游。半年后,曹寅在扬州天宁寺病逝,彻底告别了畅春园。雍正六年(1728),十三岁的曹雪芹随家人回到京城,初居在崇文门蒜市口一带的十七间半房内。家庭的巨大变故,南北风貌的差异,都对这位早熟、聪颖、敏感的少年形成强烈的刺激。那个风花雪月的江南故园,成为他回不去的“秦淮旧梦”,这也使他在梦境中更加留恋那些故去的岁月。

此时,曹家出了多位在皇帝身边供职、位高权重的富贵亲戚,曹雪芹的姑父老平郡王纳尔苏,是世袭铁帽子王礼亲王代善的六世孙,据说曹雪芹有过一段在小平郡王表哥福彭身边“行走”的经历。曹雪芹的表哥小平郡王福彭深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赏识,十八岁时袭平郡王爵。福彭早年被康熙帝召入宫中,陪皇子弘历、弘昼读书,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在军机处行走,是当时最年轻的军机大臣。曹雪芹与这位长自己七岁的表哥来往密切,跟随他多次进入皇家园林,这为他了解北方园林的宏阔、宫廷的礼仪制度以及王府的生活创造了条件。《红楼梦》第十八回《皇恩重元妃省父母天伦乐宝玉呈才藻》写到元妃回家省亲的礼仪:太监拍着手跑过来说“来了来了”。庚辰本夹批写道:“难得他写得出,是经过之人也。”这段描写非常精彩,头绪多但纹丝不乱,为什么?因为曹雪芹见过,懂得皇家的礼仪。所以他笔下的大观园有着生活存在的真实性,但又不是一个具象园子的缩影。

乾隆帝酷爱园林,在他的主持下,北京最终形成了“三山五园”的皇家园林区。乾隆帝兴建清漪园时,曹雪芹就生活在西山,此时也正值他《红楼梦》创作的高峰期。大观园中稻香村、藕香榭、畅观楼、嘉荫堂、含芳阁这些耳熟能详的建筑名称,很多都在皇家园林中真实存在着,由此可见其相互借鉴的关系。

曹雪芹是位“爷”,他的家族与园林的缘分,他睁眼看到的美好世界与十三年园林环境的浸染,他后来行走过的足迹,都让其园林审美进入到一个旁人无法比拟的崇高阶段。曹雪芹的血液里,流动着几代人形成的园林基因,这使他笔下的大观园优美而自然地体现出中国士人对自然与生命的阐释和理想寄托。 □李明新



气势恢宏的大观园全景